

安特生在中国——从矿务顾问、化石采集者到考古学家

韩琦

提到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人们最先想到的便是考古史上著名的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所提倡的中国文化西来说饱受批判,并曾一度淡出人们的视线。然而回顾历史,安特生不仅在考古学领域有开创之功,对中国地质学的早期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华十余年间,他是如何实现从地质学家、化石收集者到考古学家这一身份的转变?他在地质学、古生物学等领域有哪些研究成果?对中国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在此主要依据安特生相关论著,并结合瑞典、美国等国档案馆所藏书信,结合时人及后人评价,试图还原他在中国开展的诸项科学活动。

安特生与中国

安特生 1874 年出生于 Knista,1892 年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学习,1902 年获博士学位,1900 年至 1906 年 10 月在该校任教。19 世纪末,他曾前往南北

今年是安特生发现周口店遗址 100 年。安特生自 1914 年抵达北京,受聘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务顾问,到 1926 年返回瑞典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地质学教授,在华工作长达 12 年。他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称中国为“第二祖国”,抗战时期他还从道义上批评日本的侵略行径,支持中国。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下,他以自己的学术兴趣为导向,敏锐地把握住各种线索,充分协调利用各方资源,成功实现了从地质学家到化石收集者,再到考古学家的身份转换。

极进行探险,1906 年开始担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0 年,第 11 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他担任大会秘书长,与各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建立了联系。瑞典是欧洲重要的铁矿产地,他对本国铁矿矿藏情况有很多了解,以此次大会为契机,主编并出版了《世界铁矿志》(*The Iron-Ore Resources of the World*,1910)一书。

安特生自 1914 年 5 月 16 日抵达北京,受聘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务顾问,到 1926 年返回瑞典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地质学教授,在华工作长达 12 年。1927 年起他担任瑞典远东博物馆馆长和考古学教授,直至

1939 年退休。他一生著作颇丰,著有《龙和洋鬼子》(*The Dragon and the Foreign Devils*,1928)、《中国人和企鹅》(*Kineser och Pingviner*,1933)、《黄土地的女儿》(*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1934)以及《中国为世界而战》(*China Fights for the World*,1938)等书,文笔流畅,可读性很强。他还创办了《远东博物馆馆刊》,刊登了自己的一些文章,内容包括史前中国及鄂尔多斯青铜器等研究成果。

安特生在华最初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中国政府寻找煤矿和铁矿,找矿之余考察了山东、山西、河南、甘肃、内蒙古、江苏等

地地质。1916 年,他来到山西,发现当地有丰富的植物及哺乳动物化石,由此产生对化石收集的强烈兴趣。1918 年 8 月,他制定了“依托中国基金在华自然史采集总计划”,希望获得瑞典方面的支持。1921 年,由于在渑池仰韶发现彩陶文化,开始转向考古学研究。他还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陈列馆馆长,致力于化石的采集和陈列。

安特生第二次来华则与瑞典皇储中国之行密不可分。1926 年 5 月,作为一名业余考古学家的皇储古斯塔夫六世(Gustaf VI Adolf,1882—1973)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他对艺术和考古都有浓厚的兴趣。瑞典虽为小国,但

为突出瑞典在世界文化史中的独特地位,皇储十分期待和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建立密切关系,故邀请安氏作为中国之行的陪同人员。是年秋,安特生为他的中国之行先期作了特殊安排。9 月 11 日,安特生与新常富(Erik Nyström,1879—1963)抵达沈阳(奉天),随即前往北京为皇储来华做准备。10 月 16 日,皇储皇妃经日本抵达沈阳,随即乘火车到北京,后访问了山西、天津、南京、上海等地,11 月 18 日自上海离开中国。在沪期间,皇储、安特生与时任淞沪商埠总办的丁文江会面。1927 年 4 月,安特生离开中国。

安特生第三次来华主要是为实现此前的承诺,归还藏品。根据此前他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签订的协议,在中国收集的古生物化石或彩陶等物需对半分,没有副本的材料在瑞典做完研究后要返还中国。1936 年 11 月 26 日,他抵达上海,随后前往南京参访珠江路地质调查所新址。1937 年 2 月,他再次来到上海和南京,停留了五周,分别在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地质调查所等处举行演

(下转 5 版) ➡

➡ (上接 3 版)

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安全、文化等社会领域。因此,今天所讲的“创新发展政策”应是包括“科学发展政策”“技术发展政策”“产业发展政策”“环境发展政策”“贸易发展政策”的协调整合,这是从“创新政策”到“创新发展政策”拓展的基本思想。

研究中国特色,构建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创新生态

近年来,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引领下,企业的创新活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迸发:作为全国第一个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中关村目前已有 300 多家上市公司,2 万余家高新技术企业、一大批“独角兽”企业。支付宝和微信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移动支付市场,率先迈入无现金社会。还有一大批以联想、华为、小米为代表的

本土创新企业,已经走出国门成为享誉世界的知名品牌……

这一切都让人难以想象,40 年前的中国还是一个物质全面短缺的年代,更遑论创新。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李垣教授对 40 年企业的创新发展史进行了回顾。他指出,最初国家政策对企业创新的重点在于克服当前短缺,主要方式是以模仿创新和渐进创新的方式对生产效率进行改进。到了第二阶段(1989—1998),企业创新通过引进和消化国外技术的方式,重在过程创新。而直到第三阶段(1999—2008),“自主创新”的概念才第一次出现,国家出台新的政策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民营企业和新业态的创新加速。从 2009 年到现在,随着产业升级的紧迫性增大和高端竞争加剧,企业创新由“合作和跟随创新”向“自主和领导创新”转变。企业开始关注内部创新能力体系和外部创新生态构建,新的商业模式快速涌现,一些新业态引领世界。李垣还

认为,未来十年企业创新的重点应当从依赖满足外向经济需求转向扩大本土消费,催生新的产业。在新技术领域持续突破的同时,加速绿色创新、包容创新和国际合作方式创新,形成全面创新的态势。结合中国转型阶段、文化特征和特殊政企关系,构建具有竞争优势且难以被模仿的创新生态。

中国科学院大学柳卸林教授进一步指出,企业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一个开放的流动性生态系统,但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文化背景认同,降低因人口过于多元化导致的“知识隔离”。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各个地区积极促进区域知识生产各要素和部门的有效联动和互动协作,增加区域产业多元化和抑制性发展,外地包容性与本地文化保护并行,同时也要注重提升知识成果转化效率。要素的多元性、异质性、集聚性、开放性,可以促进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吉林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蔡莉教授则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讨论新技术对创业活动的

影响:数字技术对企业创业活动既有正面影响——数字技术的开放性、关联性和可扩展性能提高创业配用资源的效率,通过促进资源的不断整合及新机会的出现促使创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但同时也对企业创业活动有着负面影响,数字技术的可编辑性和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为创业企业的生存带来威胁,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创业企业资源的获取和资源配用效率的提高。

坚持全球视野,以“平等、合作、互惠、共赢”的价值观拓展发展空间

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也为中国未来科技改革和创新政策的演进带来了新命题、新挑战。“中国创新发展已深刻改变了全球竞争基本格局,现为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合作’关系向‘互补合作’关系转变,以及与发达国家的‘互补合作’关系向‘竞争合作’关系转变。大

国崛起需要以社会价值观转变为支撑,要摒弃‘自我为中心的单边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以‘平等、合作、互惠、共赢’的价值观拓展发展空间,从‘注重吸纳利用全球创新要素’向‘注重为全球创新者提供服务’转变。”穆荣平这样说。

科技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贺德方研究员也指出,坚持全球视野、开放创新,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强全方位的科技开放合作,既是我国现阶段科技发展的自身要求,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预期。据他介绍,今年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开放合作。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多元化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一极,包括参加国际多边机构,建立创新对话机制,其中和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就是中美科技协定优于中美关系协定开放。这些工作都在稳步推进,体现我们坚持开放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决心,体现我们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发起国际大科学工程和大科学计划的担当和责任。